

■ 新作聚焦

陆天明长篇小说《幸存者》：

骄阳，或父辈的旗帜

□ 徐刚

“我要写下我们的一生，并给自己一个活着的理由。”这是陆天明在《幸存者》的扉页上写下的句子。在众多将写作与生命轻易勾连的说辞中，这算不上有多么精彩，但对于74岁的作者来说却非同寻常。这位虔诚的写作者无疑有备而来，而为数不多的将个人经历融入其间的《幸存者》也显然被寄予厚望。作为他“此生最后的一个心愿”，一代人的理想主义被郑重地铭刻在此，他希望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群如玄奘般“以命来博取真经，并坚守初衷的义士高人”。如其所言的，这是最后的理想主义者，从他们的青春和热忱中，我们能够真切感受到作者的自我激励，“剖开这些文字，会有血流出来”。

革命年代，或遥远的知青岁月

《幸存者》开头便设置悬疑，渲染广袤的卡拉库里荒漠里特殊年代的紧张气氛。在此，扣人心弦的“武术”故事和迷雾重重的腐败真相为小说情节埋下伏笔。陆天明正是通过这种引人入胜的悬疑方式将小说引向遥远的知青岁月。在那里，满腔热忱的上海青年投身时代大潮，来到荒凉的大西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正是那个年代的共同理想。垦区的艰险并没有磨灭他们的意志，尽管等待他们的是阴谋和罪孽……

小说中值得注意的是，知青的艰苦虽极为触目，却并没有被渲染成流行的苦难与伤痕，叙事者反而着力刻画主人公身上“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理想主义之光，以此作为一代人的青春写照。这种理想主义的知青叙事我们当然并不陌生，但《幸存者》更为重要的地方在于，它惊心动魄地正面触及了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而且此间的主角并没有如人所料地被寄予简单的荒诞与暴力色彩。某种程度上，作为小说的理想主义内核的主要承载者，正是主人公谢平带领我们去重新认识那场被冠以“革命”的伟大运动。他以反对特权为己任，执着追求着绝对的公平。然而，理想主义的热血青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之中看到的尽是基层匪夷所思的阴暗面。就像他在批判林辅生时所说的，他的“生活方式已经离无产阶级越来越远，已经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化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异曾使谢平苦闷、彷徨，但也终于让他行动起来，去努力改变这一切。因而在此，谢平人不再被简单定性为毋庸置疑的反面人物，尽管在其内部也不乏贺老五这种公报私仇贪图享乐的投机分子，但小说总体上还是试图理解他们的行动逻辑，去领悟他们的情感与歌哭，尤其是那种朴素的乌托邦冲动。小说对一代人的理想主义寄予深切的历史同情，但同时可以看出，作者试图借此去解释那场运动究竟何以发生。

■ 评论

家风 民风 国风
——读忽培元小说《家风》 □艾克拜尔·米吉提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家风，这是几千年文化积淀的结果。应当说，有了好的家风，才会有好的民风；好的家风和好的民风，奠定了好的国风，自然也就会有好的世风。忽培元小说《家风》，便揭示了往往容易被人们忽略的这一规律。

小说别开生面地将矛盾集中展现在开篇。主人公老李在2014年的清明时节，一个春雨潇潇的日子，一厢情愿地携着儿子太行、儿媳秋云、孙女楠楠，风尘仆仆回到太行山深处的老家——小山村槐石岭。原本想让他们拜拜父亲李正修和连他本人也未曾谋面的烈士李正彤叔叔之墓，以期接接地气，让后代传承老李家的家风。不料老李在家乡亲人面前险些颜面丢尽。儿媳秋云出身高干，心性清高，是一位京城小有名气的诗人，像许多衣食充裕的知识女性一样，有志向、有追求，但更有许多莫名其妙的焦虑与忧愁，常常唉声叹气，甚至为自己“生不逢时”而徒生烦恼。儿子在银行系统工作，看上去孝顺。但是，过于看重物质的儿子和我行我素的儿媳，让这个65岁的小老头儿无所适从，脸上发烫。他知道儿子和儿媳处在老一辈难以启齿的“离婚”边缘。这并不是因为“一些都市小夫妻之间难以向外人启齿的细小分歧而闹别扭”，而是对待生活的根本态度与人生目标似乎格格不入”。这显然不是老李一人的心头之痛，也是很多当代人的人生之痛、社会之痛。

虽然儿子和他一起仔细清除坟前的杂草，孙女从山坡草地上采来鲜花献在二老坟前，儿媳秋云却远远站在那块巨大的石头上摆弄手机，怀里抱着黑白两色的宠物猫，苍白憔悴的面部表情显得十分忧郁，与眼前的情景恍若隔世。即便孙女楠楠在喊：“妈妈，快来呀，咱该给两位太爷爷，不对，是革命前辈默哀致敬了。”对于女儿的喊声，秋云没有丝毫反应，她也许根本没有听见，或许是听见了只是不愿意搭理。“反正她的内心活动谁也搞不清楚。”当他们爷孙三代人为两位前辈跪拜默哀时，秋云则在一旁

“群体飘移和个体异化”

《幸存者》里处处充满了辩论的声音，叙事者往往通过辩论来阐释革命和理想的真谛。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这种辩论不断延展，话题也由革命理想延伸到现实生活。在革命的大潮过后，作者开始转向自己更为熟悉的官场故事，着力解决之前留下的“龙口闸门垮塌事件”的悬疑，这便使得知青小说与反腐题材实现了有效结合，而二者的关联事实上也极为自然恰当。

这一代人究竟是“喝狼奶长大的”，还是“千年不倒的胡杨”，或者怎么也得是一从高大的“红柳疙瘩”，小说通过这个腐败案件的深入调查将人群做出区分。谢平、李爽、向少文等人自不待言，执著查明真相的他们用不灭的理想主义证明了“共和国骄阳”的价值所在；而被谢平批斗过的林辅生却出人意料地摆脱了嫌疑，这其实只是一个老于世故的官僚主义者，他懂得更有策略的自我保护，其理想和热情依然深藏内心，这便有些类似于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里的刘世吾；最后的罪魁当然是隐藏最深的苏政委，他的“老会堂”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都极尽奢华，同样的悲剧人物还有苏政委的爪牙钟绍灵，他“必须服从他不知道不该服从的指令，拒绝不了他不该接受的种种诱惑”……

正是通过将知青故事与反腐故事的结合，作者有效串联了两个不同的时代：“革命年代”与“改革年代”。这里当然涉及到昔日的革命者如何面对新时代的问题。无论如何，时代的变迁总是令人百味杂陈的。因此可以想见当他们陷入到纷繁的日常生活之中时的场景：他们纷纷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如袁雅芳所说，“中国向何处去？轮得到我们这种人去考虑吗？真是的！谁真的需要我们去考虑？我们都是瞎起劲啊。真是瞎起劲啊。”就像小说所指出的，人们从执著于“消灭敌人”，“为了建立新中国冲啊！”到执著于“领导心里有没有我”，人们学会了乖巧和见风使舵，而顺理成章地，“革命的队伍”变成了“挣钱的队伍”。在这样的时代，不少办事机构里集聚了一些“能听话、知通融、善妥协、热衷长袖善舞、精通在种种周旋中摆平各种关系的官场‘操盘手’”，而更多人则变成了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就是小说反复强调的“群体飘移和个体异化现象”，也被认为是我们今天一切腐败的终极来源。

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

从某种意义上讲，《幸存者》其实是在有意识地清理革命的遗产和债务。如小说所指出的，“丢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会出现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和叛徒；妄想一步走进共产主义，会导致盲动和左派幼稚病。同样会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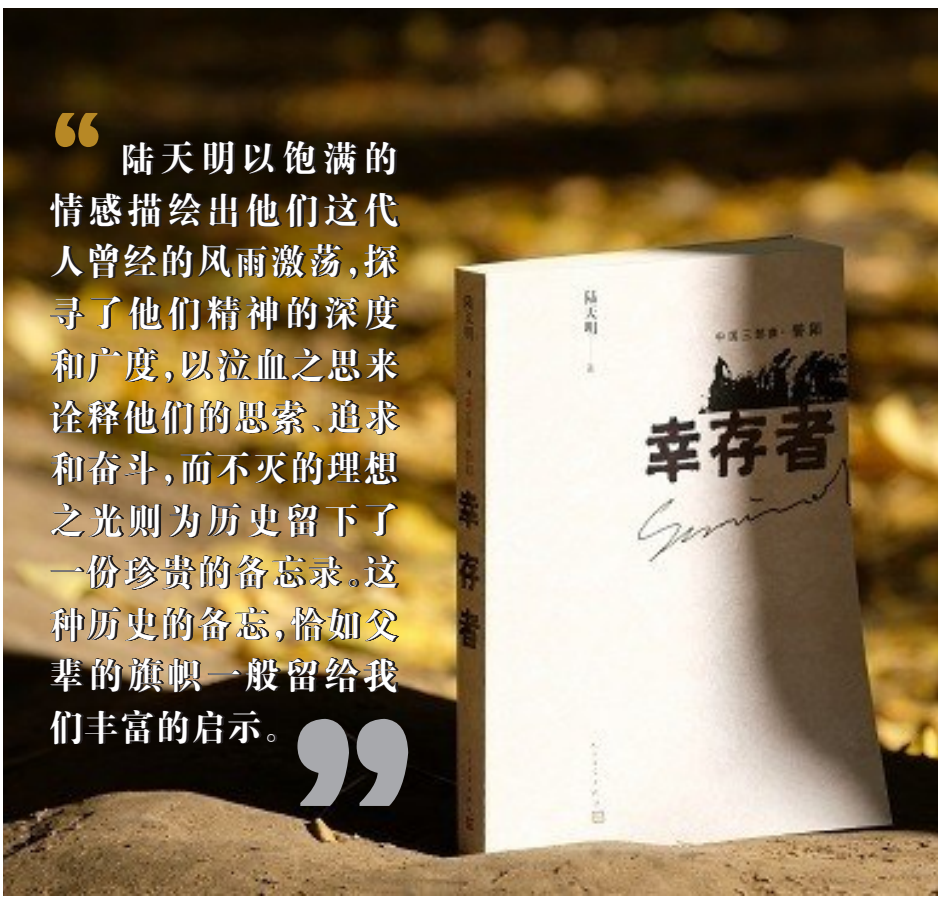
我们的革命事业伤筋动骨。”这便对谢平的行动做了一分为二的评价。他的理想主义固然可贵，但他也显然须为自己的盲动和幼稚付出代价，如小说所言的，任何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生都会在承受“曲折”。作为时间的俘虏，历史的永恒人质，谢平不得不用自己的遭际为这种“曲折”打下注脚。12年的牢狱生涯，成为他成长的代价，也是他必须承担的历史罪责。其间的人生起落、命运无常，令人唏嘘感慨。

在革命的大幕落下之后，历史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新时期”。而当谢平回首这一切，不断追问“到底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时，我们大概会以为这只是一个怀抱改变世界梦想的人被世界所改变的残酷故事。然而，我们错了。“不要在孤独和闭塞的环境中磨灭了自己身上那可贵的生活热情和为理想拼搏的激情。”这才是小说执意告诉我们的谆谆教诲。在这样的时代，理想何为？想必谢平身上所看到的才是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这是一个认清了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洞悉了理想的实质却仍旧怀抱理想的人，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一个“死不悔改”的人。

令人意外的是，12年之后的谢平艰难获得了返城的机会，但他并不是识时务的俊杰，历史给了他机遇，但他显然不愿做新的市场时代的英雄，而依然不合时宜地扮演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的角色。这位如王安忆小说《本次列车终点》中无地彷徨的“返城者”，几乎被所有人都宣判为一事无成时，却毅然决然地重返荒漠，踏上了悲壮的正义者之路。他始终不能忘却的是当年的理想，“为了革命，为了中国，为了全人类”。不可否认，这个略显矫情的呼号，却是治愈时代病症的一剂良药。用高扬的理想主义大旗去克服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腐败陷阱，这应该可以算作小说对于革命遗产的生动阐释，也是我们面对今天这个时代的意义所在。

就这样，陆天明以饱满的情感描绘出他们这代人曾经的风雨激荡，探寻了他们精神的深度和广度，以泣血之思来诠释他们的思索、追求和奋斗，而不灭的理想之光则为历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备忘录。这种历史的备忘，恰如父辈的旗帜一般留给我们丰富的启示。

我们的革命事业伤筋动骨。”这便对谢平的行动做了一分为二的评价。他的理想主义固然可贵，但他也显然须为自己的盲动和幼稚付出代价，如小说所言的，任何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生都会在承受“曲折”。作为时间的俘虏，历史的永恒人质，谢平不得不用自己的遭际为这种“曲折”打下注脚。12年的牢狱生涯，成为他成长的代价，也是他必须承担的历史罪责。其间的人生起落、命运无常，令人唏嘘感慨。



“陆天明以饱满的情感描绘出他们这代人曾经的风雨激荡，探寻了他们精神的深度和广度，以泣血之思来诠释他们的思索、追求和奋斗，而不灭的理想之光则为历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备忘录。这种历史的备忘，恰如父辈的旗帜一般留给我们丰富的启示。”

我们的革命事业伤筋动骨。”这便对谢平的行动做了一分为二的评价。他的理想主义固然可贵，但他也显然须为自己的盲动和幼稚付出代价，如小说所言的，任何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生都会在承受“曲折”。作为时间的俘虏，历史的永恒人质，谢平不得不用自己的遭际为这种“曲折”打下注脚。12年的牢狱生涯，成为他成长的代价，也是他必须承担的历史罪责。其间的人生起落、命运无常，令人唏嘘感慨。

在革命的大幕落下之后，历史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新时期”。而当谢平回首这一切，不断追问“到底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时，我们大概会以为这只是一个怀抱改变世界梦想的人被世界所改变的残酷故事。然而，我们错了。“不要在孤独和闭塞的环境中磨灭了自己身上那可贵的生活热情和为理想拼搏的激情。”这才是小说执意告诉我们的谆谆教诲。在这样的时代，理想何为？想必谢平身上所看到的才是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这是一个认清了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洞悉了理想的实质却仍旧怀抱理想的人，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一个“死不悔改”的人。

令人意外的是，12年之后的谢平艰难获得了返城的机会，但他并不是识时务的俊杰，历史给了他机遇，但他显然不愿做新的市场时代的英雄，而依然不合时宜地扮演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的角色。这位如王安忆小说《本次列车终点》中无地彷徨的“返城者”，几乎被所有人都宣判为一事无成时，却毅然决然地重返荒漠，踏上了悲壮的正义者之路。他始终不能忘却的是当年的理想，“为了革命，为了中国，为了全人类”。不可否认，这个略显矫情的呼号，却是治愈时代病症的一剂良药。用高扬的理想主义大旗去克服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腐败陷阱，这应该可以算作小说对于革命遗产的生动阐释，也是我们面对今天这个时代的意义所在。

就这样，陆天明以饱满的情感描绘出他们这代人曾经的风雨激荡，探寻了他们精神的深度和广度，以泣血之思来诠释他们的思索、追求和奋斗，而不灭的理想之光则为历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备忘录。这种历史的备忘，恰如父辈的旗帜一般留给我们丰富的启示。

我们的革命事业伤筋动骨。”这便对谢平的行动做了一分为二的评价。他的理想主义固然可贵，但他也显然须为自己的盲动和幼稚付出代价，如小说所言的，任何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生都会在承受“曲折”。作为时间的俘虏，历史的永恒人质，谢平不得不用自己的遭际为这种“曲折”打下注脚。12年的牢狱生涯，成为他成长的代价，也是他必须承担的历史罪责。其间的人生起落、命运无常，令人唏嘘感慨。

在革命的大幕落下之后，历史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新时期”。而当谢平回首这一切，不断追问“到底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时，我们大概会以为这只是一个怀抱改变世界梦想的人被世界所改变的残酷故事。然而，我们错了。“不要在孤独和闭塞的环境中磨灭了自己身上那可贵的生活热情和为理想拼搏的激情。”这才是小说执意告诉我们的谆谆教诲。在这样的时代，理想何为？想必谢平身上所看到的才是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这是一个认清了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洞悉了理想的实质却仍旧怀抱理想的人，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一个“死不悔改”的人。

令人意外的是，12年之后的谢平艰难获得了返城的机会，但他并不是识时务的俊杰，历史给了他机遇，但他显然不愿做新的市场时代的英雄，而依然不合时宜地扮演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的角色。这位如王安忆小说《本次列车终点》中无地彷徨的“返城者”，几乎被所有人都宣判为一事无成时，却毅然决然地重返荒漠，踏上了悲壮的正义者之路。他始终不能忘却的是当年的理想，“为了革命，为了中国，为了全人类”。不可否认，这个略显矫情的呼号，却是治愈时代病症的一剂良药。用高扬的理想主义大旗去克服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腐败陷阱，这应该可以算作小说对于革命遗产的生动阐释，也是我们面对今天这个时代的意义所在。

就这样，陆天明以饱满的情感描绘出他们这代人曾经的风雨激荡，探寻了他们精神的深度和广度，以泣血之思来诠释他们的思索、追求和奋斗，而不灭的理想之光则为历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备忘录。这种历史的备忘，恰如父辈的旗帜一般留给我们丰富的启示。

我们的革命事业伤筋动骨。”这便对谢平的行动做了一分为二的评价。他的理想主义固然可贵，但他也显然须为自己的盲动和幼稚付出代价，如小说所言的，任何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生都会在承受“曲折”。作为时间的俘虏，历史的永恒人质，谢平不得不用自己的遭际为这种“曲折”打下注脚。12年的牢狱生涯，成为他成长的代价，也是他必须承担的历史罪责。其间的人生起落、命运无常，令人唏嘘感慨。

令人意外的是，12年之后的谢平艰难获得了返城的机会，但他并不是识时务的俊杰，历史给了他机遇，但他显然不愿做新的市场时代的英雄，而依然不合时宜地扮演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的角色。这位如王安忆小说《本次列车终点》中无地彷徨的“返城者”，几乎被所有人都宣判为一事无成时，却毅然决然地重返荒漠，踏上了悲壮的正义者之路。他始终不能忘却的是当年的理想，“为了革命，为了中国，为了全人类”。不可否认，这个略显矫情的呼号，却是治愈时代病症的一剂良药。用高扬的理想主义大旗去克服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腐败陷阱，这应该可以算作小说对于革命遗产的生动阐释，也是我们面对今天这个时代的意义所在。

■ 创作谈

上世纪90年代初，小说《泥日》出版时，我曾在书的扉页上为自己写过这样一个“作者小传”：“陆天明。大胡子。1943年10月生于昆明。长于上海。10岁丧父。14岁离开家，当过农民，山村小学教师。16岁患肺结核。吐血。没死。后来又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过农工班班长。武装参谋。老兵连代理指导员。一个绝非偶然的机会，他获准在北疆滴水成冰的季节，把自己关在无法生火的破库房里，编造作家梦。他很笨拙。常常觉得自己可能来不及写完所要写的那些东西。这是他所有那些很古怪的预感里唯一还没得到证实的预感。”后来，自然地又活了几十年。一直到今天。我写过知青题材、反腐题材、革命历史题材；也一直坚持着跟踪当代巨大而剧烈的现实生活变迁。先后出过9部长篇小说。既搞“纯文学”实验文体的探索，也涉足最广大群众通俗的影视话剧创作，甚至写了数十部集颇有社会影响的电视剧。但一直没能摆脱那个“来不及写完所要写的那些东西”的梦魇的纠缠。

我追问自己，你到底还想干什么？

我明白，我想为自己这一代人立传。或者说为这一代人中的某一群人立传。无论怎样，我的时间都不可能太多了。我要把对这个世界要说的话赶紧说出来。说出只有我们这代人才知道的事实。我要告诉人们，中国曾经产生过这样一批“理想主义者”。他们以追求无私和崇高、深入民间、与最底层的民众一起去改变祖国面貌为己任。他们为此付出过令人难以想象的代价。他们的这种“狂热冲动”不光是一种盲从，也是那一代青年的生活本质（托马斯·沃尔夫语）。常识告诉我们，每一代人都不能逾越时代给予的特点和桎梏。所以，正像我在小说中说的那样：“在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我们往往都在扮演看半是同盟者半是受害者的角色”。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追求崇高是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于是我们举起了“青春无悔”的大旗。而这些人的故事是不应该被掩埋在历史的灰烬中的。

要为一代人立传，又岂是轻而易举做得下来的？！这确实让我忐忑，深感不安。我用5年的时间来为“幸存者”做准备。我要求自己用一种“飞蛾扑火以求一逞”的心态去做这部小说，这也是一种誓言和决心。

用什么书名来命名它曾煞费一番周折，最后才定下这个“幸存者”。“幸存者”的含义很多，但对我来说，我们这一代人和共和国的几代人都存在着这样一个使命，就是让我们的中国变得更好。这个愿望也可以说是近百年来先烈先贤所共同的愿望。站在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站在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馆前，站在全国各地先烈先贤的墓碑前，我们这些全都是“幸存者”。所以，具体到写我们这一代人，也就是在写幸存者。既然要为一代幸存者立传，势必得写得真实、务必准确。既不为其“社会成见”和“时尚风尘”所动，也要力争不被自己的旧习和偏颇局限。就得争取有一点“史”的风骨。但它毕竟又是文学，还应有“诗”的境界。多年来热衷于写当代题材的我自然明白，确保作品有“史”的风骨似乎更难于在言说中透出诗的品质。尤其是中国这40年所发生的巨变几乎重塑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这一代人”也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继续奋斗，重塑自我。这就要求在描摹的烈度中见其细微，在言说的激愤中铸其真心，用他们生命的演变佐证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剧变，如果还能提炼出必需的一些思想资源自然就更好了。还有一点，也是我在写作中刻意追求并执著实践的文学理念，那就是：作品中既要有作家的独立思考，有强烈独特的自我个性色彩，又要呈现传统现实主义创作的强大魅力；既要保持文学的独立品格又要充分顾及广大民众的阅读和审美需求，也就是既要深刻独到，也要好读好看。希望让更多的人在阅读这部小说时“拿得起放不下”，读完了呆坐一会儿，掩卷深思。当然，《幸存者》只是计划中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后边的路还很漫长。

几年前，我给自己的文集写过一个序。我借用了19世纪美国思想家爱默生说过的一句话：“剖开这些文字，应有血流出来。”写作《幸存者》时，我一直惦记着这句话，并力图让它一直烧灼着我那敲击键盘的手指和始终守望某种理念的心。

(上接第1版)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宣传部、文明办要切实抓好组织协调和指导推动，围绕着力培育新型农民、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弘扬新风行动、着力丰富农民群众文化生活、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补齐贫困地区精准扶贫的“精神短板”，切实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要切实发挥农村党支部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作用，带领农民群众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学好致富技能和本领，齐心协力把乡村振兴战略要求落到实处，让农民群众在共建共享中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焕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 看小说

张翎《都市猫语》
萍水相逢亦温馨

张翎的《都市猫语》(《花城》2017年第4期)写了两个青年男女萍水相逢的故事，在逐步认识、互相了解、消除误会和加深感情的过程中，呈现出一幅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感人温馨画面。

叶茂盛因家中多事不顺外出打工，在城郊租了两间旧平房，收养了一只叫“老黄”的流浪猫，为了省钱，他托人找了个房客来分担房租，谁知却来了一个叫赵少芬的女子，还带着一只叫“小黑”的猫。就这样，一男一女与两只猫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人物与“猫语”构成了颇有意思的二重奏。他白天开出租车，晚上上班；而她昼伏夜出，晚上上班。两人很少见面，为了沟通信息，他们在冰箱上贴上小纸条给对方留言。两只猫也逐渐熟络起来，老黄很怜爱小黑，每次喂食都让它先吃。叶茂盛琢磨不透并一直想弄清赵少芬的职业，有天他晚上回家休息，却撞上了赵少芬和另一个男人。他愤怒地叫那男人滚出去，赵少芬这才说出自己是洗脚妹，有4个姐姐，1个弟弟，而弟弟要换肾需20万，父亲叫她们5个姐妹出来各自赚4万元回家救弟弟。她为了早日完成任务，才不得已这样做。叶茂盛听了之后很感动，想挽留她，但她却执意要带着小黑离开。小黑走了，老黄不吃不喝，一日比一日更瘦。一天，小黑又跑来了，老黄的病自然好了。过了几天，赵少芬也回来了，夜里，她炒了几个菜请叶茂盛喝酒，又给他洗脚、揉脚。还说她已经赚了4万元，明天就准备回家了。叶茂盛为她感到欣慰，第二天开车送她到火车站，并吩咐她路上小心，注意安全。

小说在起伏跌宕中表现出平凡人的善良秉性，在曲折迂回中显示真感情。两位主人公在不快中产生隔阂、误会和疏远，在知晓真相后，叶茂盛又宽容和原谅了赵少芬，这使得情节多有变化，在平淡处突起高潮，在转折中又见转机。更有趣的是，在写人的同时，小说还很细致地写了两只猫的举动和表现，它们互为依偎、彼此相怜，给紧张曲折的情节增添了几分欢乐和情趣，很好地烘托了人与人、人与动物和谐而又温馨的氛围。(杨国庆)